



回忆五六十年代的清华男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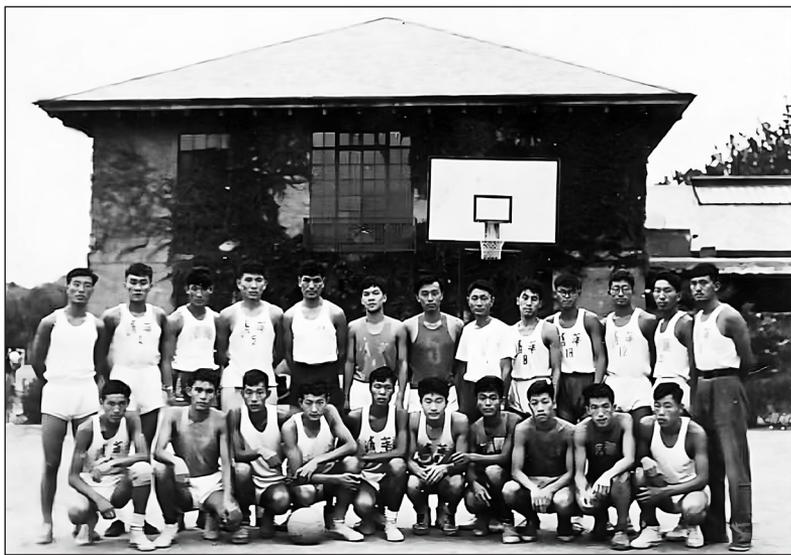
○王光纶（1963届水利）

1957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在我入学报到后的第三天，校篮球队的胡燕庚同学就来找我，让我跟他去见校男篮教练曹宝源老师。见到曹先生后，他让我两天后随校男篮去张家口市进行访问比赛。也就是说我一进清华大学还没开始课堂学习，就首先进入了校篮球队。当时男篮队里年级最高的队员是八字班的樊本德、牟灵泉、翁立臣、尹翼开，接下来是零字班、一字班的李蒙、金涤尘、俞颐秦等，我进队是班级最低、年纪最小的，老大哥们都亲切地叫我“小老弟”，令我感到非常温暖。

在张家口进行篮球比赛还有个“身份

三变”的趣事。1957年暑期高考后，我代表北京中学联队到张家口比赛，当时的身份是中学生；不久，张家口市组队到北京访问比赛，北京青年队（专业队）因刚刚组建，缺少组织进攻的人，于是又把我叫去帮助北青队和张家口队比赛，这时我的身份又变成了专业运动员；这次清华男篮到访，也就是第三次相遇，我代表清华大学参加比赛，身份又变成了大学生。张家口队中和我打过三次比赛的队员就比较熟悉了，对我打趣地说：“你是孙悟空呀，变得真快，一个月里变了三个身份！”

1958年暑假，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北京市青年赴长山列岛海防前线慰问



1958年，清华男篮在球场欢送老队员。后排左2为王光纶学长



1959年，清华男篮部分队员在体育馆内篮球场合影

团”，作为慰问团的组成部分，清华和矿院的部分校篮球队员组成了一支篮球队，队中来自清华的有我、李志敏、宋尽贤、梁长青等。慰问团中还包括了国家体操队、北京舞蹈学校的演出队，以及英模代表。劳模、北京建筑青年突击队队长张百发特别爱看篮球，所以和我们篮球队很熟。后来他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有一次在工体看我们比赛，他还特意在主席台上和我打招呼。

我们篮球队这次和驻防不同岛屿的战士球队打了五场比赛，丰富了战士们的业余生活，通过比赛和战士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慰问比赛过程中还有过一次“小惊险”，有一次到一个小岛去慰问比赛，只能乘平底的小登陆艇去，恰巧那天遇到了风浪，船颠簸得特别厉害。战士们都是久经考验的“铁人”，一个个仍稳如泰山坚守工作岗位，可是我们这些陆地来的“旱鸭子”就不行了，几乎所有人都被扶到舱内躺下，甚至有的已经呕吐、眩晕。李志敏、梁长青和我三个人感觉还比较

好，就站到船头甲板上想体会一下颠簸冲浪的刺激。过了一会儿，志敏突然也不行了，大口吐出胃液，足足喷出两三米远。几位战士马上跑过来把他搀扶到舱内躺下。我和梁长青就成为坚持到最后的“英雄”，战士开玩笑说，清华篮球队员还真挺厉害的。

1960年4月，我校男女篮被批准到济南参加全国篮球丙级联赛，决定晋级乙级联赛的名额（男、女队各两名）。当时男篮参赛的队员有蔡运枢、于瑞堂、李蒙、金涤尘、俞颐秦、曾宪成、李志敏、刘俭、刘维麒、张祥和我。联赛中我校女篮晋级成功，但男篮由于输给了山东队和北京体院队，没有晋级。但纵观整个晋级比赛过程，男篮的表现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其中和北京三队的那场比赛就是一例，该队是北京男篮专业队的青年后备队，教练是刘二柱（前国家男篮队员）。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紧张、刺激，竟然出现了三次加时赛。在加时赛中，我们在场上打球的队员还好些，反正脑子里想的就剩下一个拼字；可坐在场边等待替补的队员就特别紧张，他们紧握的双拳都攥出了汗，对场上进行的比赛是既想看又不敢看，眼睛是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更有甚者干脆转过身背对比赛场，那场面真是令人窒息。最后，还是我们赢得了这场比赛。回校后，“五四”青年节晚上全校在西大操场开会，校团委让我代表篮球队在大会上作汇报发言，宋尽贤赶紧写了一个稿子，由我到会上去宣读。当我读完紧张比赛的那一段描述后，同学们都激动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篮球队能给节日夜晚的同学们带来欢乐，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1960年8月，北京市体委向清华借调我到北京队，随陈毅副总理带领的政府代表团出访阿富汗，祝贺该国的国庆。代表团带了两支为他们国庆助兴的文体队伍，一个是重庆杂技团，一个是北京大学生篮球队。这个所谓的大学生队，实际除了体院的张泰荣和我以外，其他都是北京男篮的专业运动员。我来自清华大学，且为首发上场的队员，就成了球队的一个亮点。当时出国的人很少，中国还没有国际民航，我们是乘前苏联民航飞机从北京出发经莫斯科、塔什干才飞到喀布尔，而且最后一段还要改乘不到50名乘客的小飞机。喀布尔机场很简陋，连航站楼都没有，只有几座帐篷作为乘客上下飞机的临时停留站。

在喀布尔，我们住在国王花园的客房里，室内没有正式的床铺，我们就睡在临时支起来的帆布行军床上。当时君主制的阿富汗还是相当贫穷落后的，国庆节当天警察在街上维持秩序，竟然骑在马上手持铁头的皮带驱赶群众，当场就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这里是高原，高原训练的滋味令我们吃够了苦头，跑动起

来喘大气、身上的汗却出不来，不一会儿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根本不想动。不过，训练几天以后身体感觉就逐渐适应了。在有国王和陈毅副总理观战的那场比赛中，我们的技术发挥基本达到了正常水平。而对手阿富汗国家队的水平相对较低，上半场结束前比分拉开比较大。这时主席台上就下来人传话：“注意点，咱们是庆祝人家的国庆节，而且国王还坐在主席台上。”教练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慢慢把主力队员换下来，并要求场上队员把比分差距控制在稳定的水平。最终，总算圆满完成了任务。

1961年，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不少人都因吃不饱浮肿了。当时校党委为了让校体育代表队不要太伤“元气”，从东北农场调进一批粮食，给部分代表队队员增加定量，这一举措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困难时期过后，清华体育的竞技水平和其他高校相比发展明显地要快。当然，我个人也受益匪浅。

1963年以后，清华校男篮在北京高校中已成绝对的“老大”，二队也可以直接参加北京高校联赛。1964年8月，在北



1963年，清华男篮荣获北京市甲级联赛冠军、女篮晋升全国乙级队，受到学校领导接见。中排左起第三人：张益、曹宝源、杨道崇、张维、刘冰、马约翰、高沂、夏翔、王英杰、何介人、张慕萍，后排左4为作者王光纶

京举行全国高校篮球联赛，以清华为主组成的北京高校队获得冠军。1963年我毕业留校，已不能参加学生队的比赛，但仍可和学生一起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市级比赛和表演赛。1963、1964年的北京市篮球甲级联赛，清华大学都获得了冠军。当时的福建二队、全国空军队、装甲兵队、河南省队都曾被我们打败过，一般的专业篮球队已不是我们的对手。甚至有一次和北京队（当时全国甲级队）在体院篮球馆打教学比赛，北京队为了锻炼队伍把队员分为两组，一组是主力队员和体院队打，北京队胜；另一组是替补队员和清华队打。比赛中我和小符、小叶打了一个漂亮的反掩护，小符上篮得分，气得北京队教练张光烈马上叫了一个暂停，很不满意，觉得太丢面子了。最后是以平局告终，北京队二组总算没输给清华。

当时，外界对清华男篮也有了一定的认知，1965年下半年，西哈努克亲王想在柬埔寨举行一次青年联欢节性质的新兴国家运动会。8月，国家体委通知北京市，让清华大学男子篮球队准备代表中国到柬埔寨参加这次运动会，并且批了专门的伙食补助费，发了新的天蓝色运动服，大家都非常高兴。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运动会未能如期举行。可是伙食补助费一直发到“文革”前，为此男篮在校膳食科还专门列了一个户头，用于中午、晚上给男篮加餐，“文革”初期的大字报中，就曾有人抓住这点，批判这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特权。

男篮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固然和队员、教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特别让我无法忘记的是教练曹宝源老师对男篮无私的付出。为了男篮的发

展、提高，他真是呕心沥血。1958年我刚入队时，男篮打翻身仗，从市乙级队争返甲级队，曹先生当时胃不好，指挥比赛太专注、太紧张，如果我们输了，他会急得吐血。当看到这样敬业的老师，我们作为队员怎能不玩命训练？当练得特别累时，有时会半开玩笑地打趣：“为了不让曹先生吐血，咱们也一定要坚持练下去。”此外，动脑筋、善钻研也是清华男篮被外界公认的一个特点。体院的张泰荣（后赴香港任教练）就曾和我说过：“你们清华队打球规矩，善于琢磨对手，有股学生气。”我体会他所说的“学生气”，其内涵就是善动脑子、没有“小动作”，从来不和裁判计较，队伍的涵养比较高。除此之外还有两条也是很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保证。一个是领导关心、爱护，另一个是群众热爱、支持。清华大学师生都非常爱看男篮的比赛和训练，当时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周末如能在善斋前灯光球场看一场男篮比赛，那就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了。比赛的球场往往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不少人还爬到树上，更有甚者钻到后体育馆浴室的房顶上去看。男篮有时到城里体育场馆去比赛，“铁杆球迷”就结伙骑自行车赶到球场去看球，有时大冬天的从清华骑车到工人体育馆，一个个冻得满脸通红，我们看到这样的球迷真是深受感动。

校领导的关心和爱护更是我们男篮能够快速成长的一个重要保证。当时的蒋南翔校长对男篮就特别关爱，20世纪60年代初，有几次夏天周末晚上，男篮在北海体育场打比赛，蒋校长就从他在教育部的住所赶到现场，体育场的工作人员专门为他搬了一把椅子放在主席台的角上，他就一

个人穿着蓝布中山服坐在空旷的主席台上，看我们比赛，直到比赛结束他才默默地离开。当时看台上就有观众好奇地问我们，主席台上那个带眼镜、穿蓝布中山装的人是谁呀？怎么那么关心你们队？于是“蓝布中山装”就成了我们对蒋校长一个会意的尊称。

不仅如此，60年代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农历大年初一上午，蒋校长总要在10公寓他的住所召开一次优秀运动员座谈会，我也有幸参加过一次，是张益老师带我们去的。在会上，蒋校长逐个询问我们学习和体育锻炼的情况，随后他鼓励我们，作为大学生的体育代表队要努力地锻炼，提高运动水平，并说苏联、美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以大学生为主，我们现在还不成，嘱咐我们要努力，将来我们清华的大学生也要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听了校长这段话大受鼓舞。

除了蒋校长，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对男篮的关心和爱护就更具体了。男篮参加全国性的正式比赛他都亲自担任领队，还经常到训练现场鼓励大家。“文革”后的一天晚上，艾知生同志在校园里散步遇到我，曾和我聊起一段“文革”初期的荒唐往事。1966年6月，清华校内陆续开始揪黑帮、斗走资派，当时就有造反派质问他：“6月1号以后每天下午在党委办公室都见不到你，你跑到哪里去搞阴谋诡计了？”艾知生告诉我：“其实，那几天下午我都是处理完交办的事情后，赶紧到体育场督战男篮，备战全国高校联赛，所以他们看不到我。”艾知生同志对我个人的关怀和爱护，我也是终身难忘。1961年末，水利系组织“水利化”小分队到顺义县张喜庄公社推广装配式渠道建筑物，

小分队由一位教师带领我们班八位同学组成。当时正值经济最艰难的时期，在张喜庄我们每天只能在公社食堂吃一顿真正粮食做的老玉米稀粥，另外两顿只能吃剥掉玉米粒剩下的棒子芯磨的粉，没有蔬菜，每人每天发一根葱。住的是老乡多余的空客房，这个所谓的屋子里只有一溜土炕，窗户纸都是破的。我们晚上睡前从院里压水井打半盆凉水，坐在炕头洗洗脸、擦擦脚，然后就赶紧钻进被窝。脸盆就放在炕沿边上，第二天醒来盆里的水都会冻成冰块。在这样的条件下，没几天不少人先后因浮肿返回了学校，只剩下我一个人留下坚持。应当说我之所以还能够坚持，和在学校时有运动员粮食补助打下的底子密不可分。

有一次周末，我回校向带队老师汇报工作，在顺义公共汽车站碰巧遇到了艾知生同志。他当时是市委派下去搞调查的工作组成员，他关切地问我饿不饿？我就把在张喜庄的吃住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马上到小商店给我买了一斤高级糖。所谓高级糖大概就和现在的大白兔奶糖差不多，一斤要10块钱！当时，10块钱在他的工资收入中要占一个不小的比例，但他毫不犹疑。他把糖递给我让我吃，我虽然看见糖很想吃，但还是假惺惺地推辞了一下，他乐乐呵呵地说，看你都饿成什么样子了，赶快吃吧。于是我就很快把这一斤糖全部都嚼着咽下了肚子，艾知生同志一直坐在旁边，乐呵呵地看着我把糖吃完。这个场面我终身难忘，至今仍好像就在眼前。

正当男篮积极准备再次参加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文化大革命”爆发，男篮五六十年代的鼎盛时期也就戛然而止了。